



1405—2005
郑和下西洋600周年

论郑和下西洋

郑一钧 著



海洋出版社

修订本

论郑和下西洋

(修订本)

郑一钧 著

海洋出版社

2005 年 ·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该书是为纪念我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 580 周年,郑一钧同志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郑鹤声教授亲自指导下,经过多年准备撰写的。2005 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作者又作了重要修改。

本书涉及的面极广,从郑和的身世,到郑和七下西洋的经历及其深远意义,等等,均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是目前为止研究郑和下西洋事迹的一部最详尽论著。作者在书对中外史学界存在分歧的某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精辟的见解。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笔流畅,不仅为史学界探讨研究郑和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而且对于一般读者,也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郑和下西洋/郑一钧 著.—2 版(修订本).—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5.7

ISBN 7-5027-6375-9

I. 论... II. 郑... III. 郑和下西洋—研究 IV. K248.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2475 号

责任编辑:刘义杰

责任印制:严国晋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5 年 11 月第 2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8.75

字数:46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98.00 元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1945年7月生于四川北碚，浙江诸暨人。中国科学院1978届研究生。国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顾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马来西亚国际郑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出版专著或主编、合著《论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郑和全传》、《祖国伟大航海家、外交家郑和》、《中国航海科技史》、《中国海洋学史》、《中国海洋志》、《悠久的海洋文明》、《中国海情》、《中国海洋区域经济研究》、《浙江建设海洋经济大省研究》、《环渤海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齐国史》等书20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1991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先进工作者奖。与其父合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获1992年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

修订版前言

2005 年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 600 周年，党中央确定了“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作为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庆祝活动的主题，其宗旨就是要弘扬郑和精神。学习和发扬郑和精神，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借鉴历史的经验，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在促进世界和谐发展，加速中国的和平发展，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能够对维护世界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共同走向繁荣富强发挥重要作用。郑和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应当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15 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逐渐打破了全球东西方之间，各大洲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导致人类社会日益具有世界性，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轨时期。在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率先发生于东方的郑和航海壮举中，大批中国人顺应历史的潮流，走出国门，走向海洋，尝试用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理念，去建立一种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他们以与当时西方欧洲国家发展航海事业迥然不同的思路，以自己伟大的和平实践，在 15 世纪初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郑和下西洋，在当时亚洲海洋不靖，动乱迭起的情势下，始终致力于实现中国与海外各国“共享太平之富”崇高理想。他们以努力营造和谐的国际秩序为己任，在抑制强暴，扶助弱小的同时，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利益，通过郑和船队与海外各国间广泛开展经济交流，进行区域间的贸易整合，发展互惠互利的贸易来实现，而不是借助于欺侮掠夺弱小国界和民族。在走向世界一体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在人类刚刚面临这一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之际，首当其冲的郑和航海壮举，在没有历史的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为先辈们向往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所感召，在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创造性地采取了这样的发展模式，适应了各国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推动了海外各国社会的发展。这是以和平的手段促发展，也需要有一种国际和平与和谐的

环境来保障这种发展。郑和使团为此始终以和平使者的身份活跃于世界历史舞台之上，这一性质决定了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内涵，在当时而言，也就蕴含了“和平发展”之意，符合海外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因而得到了海外诸国的拥护，随着郑和下西洋历史的发展，中国在海外的威望也随着建立起来。当前，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愿意同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振奋了整个中华民族，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这一伟大战略构想的实现，需要我们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国家、民族开拓出不同于世界以往其他国家的和平发展道路，弘扬郑和精神，可以为今日中国致力于“和谐世界”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充实和丰富“和谐世界”的内涵。这也是此次修订本书的宗旨。

郑和精神包含着开放兼容的思想、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郑和七下西洋，时跨 28 年，长途远涉，飘洋过海，所到之处，以睦邻友好为宗旨，弘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科技成果，加强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体现了开阔的世界眼光、开明的个性和崇开放、重交流的观念。郑和下西洋创造了科学航海的世界奇迹，如我国的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一样，是民族创造力的又一次集中体现。而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热爱祖国、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团结统一、热爱和平的优良传统，无私无畏和敬业献身的优秀品质，都是郑和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就是当时的中国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表现，从中体现出通过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形成海外诸国间和平发展的格局，是郑和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我们今天弘扬郑和精神，就要以广泛开展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向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深入宣传“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这个中央确定的纪念活动主题，在广泛宣传郑和七下西洋的事迹时，使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充分认识到郑和航海对世界航海史和人类文明史的伟大贡献，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增强我们的海洋意识，在郑和精神的鼓舞下，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更好地实施中央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战略部署，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基于此，笔者在近二十年来进一步研究郑和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对本书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并把它奉献给广大读

修订版前言

者，作为向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纪念活动的献礼。由于笔者同时承担了其他一些有关郑和的著述，时间紧迫，加以水平有限，有些观点属一家之言，错误疏忽之处在所难免，恳切的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在本书修订过程中，承蒙海洋出版社刘义杰先生给予大力支持并提出许多宝贵建议，国家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家慈和家人从各方面给予关怀和大力支持，使笔者能全身心投入写作；另一方面，家严郑鹤声教授一生致力于史学及郑和研究的献身精神，众多友人对本书的修订重版寄以殷切的期望，亦激励笔者努力修订好这部著作；借此机会，一并致以致以衷心的感谢。

郑一钧

2005 年 8 月 30 日记于马来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馆

第一版前言

声振中外的郑和下西洋，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件。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东西方交通为之大变。这对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个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实由郑和航海开其端绪。在郑和下西洋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了近 2000 年的历史发展，已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当时，世界历史也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前夜。时代要求人们逐渐打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日益具有世界性。出现于十五世纪初世界历史舞台上的郑和下西洋，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明初政治，集中国两千年封建政治之大成；明初国势之强盛，为历代所未有；《永乐大典》的编纂，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壮举。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明朝永乐年间，进入封建时代的极盛时期。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对外还算是开放的。当具备了这种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又充分利用了中国和亚非国家之间长期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的成果，加上有中国造船业、航海技术高度发达和悠久航海传统的基础，郑和作为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应运而生。他以其卓越的才能、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领导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郑和下西洋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比欧洲人要领先许多年代，而且在发展中国与亚洲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友好关系方面，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十五世纪初期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及其伟大历史意义，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西方关于世界大航海时代的繁多的著述中，常常把郑和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排除在外，没有给开创这个大航海时代的中国航海家以应有的地位。中国于近代三百多年以来，由于反动阶级的腐朽统治和外来的侵略，贫弱日甚，科学与国力大大落伍于西方先进国家。正如邓小平同志 1984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

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某些西方学者，或囿于成见，或没有掌握充分的资料，从而不能对郑和下西洋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他们低估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和伟大贡献，相当程度上是为“欧洲中心论”所局限。时代发展到今天，“欧洲中心论”已发生动摇，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征途中，由于对外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政策，中国愈来愈强大，国际声望日益增高，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也愈来愈重要。中国被人瞧不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就更有理由要求恢复郑和下西洋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全面地介绍和正确评价郑和的生平事业，充分肯定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不仅是尊重历史发展本来面貌所应持的态度，更能激发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和自信心，鼓舞我们为振兴中华而奋斗，所以，研究郑和，宣传郑和的光辉业绩，发扬郑和精神，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历史使命。

1985年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580周年，笔者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郑和研究的开拓者郑鹤声教授的悉心指导下，经过多年准备，撰写了这部论著，并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作为向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大会的献礼。由于笔者是利用业余时间撰写此书，时间仓促，加以水平所限，错误疏忽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地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所涉及方面和范围之广，使郑和研究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因此，要使“郑学”进一步发展起来，仅靠国内现有的资料还是不够的。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郑和使团遍历东西洋各国，访问了众多的亚非国家，同当地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海外遗存有丰富的历史资料，需要进一步去调查、发现。尤其是那些记载有郑和下西洋珍贵史料的伊斯兰文献，有待多方搜集、整理、研究。此外，受当年郑和下西洋影响较大的东南亚国家，曾出过一些记叙郑和事迹的著作，如在南洋有马来文的《郑和传》十五册，《三保大人传》三册等等，都有待于翻译、介绍到国内来。总之，除了在国内还应该搜集整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资料外，更有大量的散布在海外的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文献资料，需要海内外学者、华侨去进一步发现、搜集和研究。笔者衷心希望有条件在海外从事郑和下西洋史事研究的学者为此作出贡献，如此势必大大丰富郑和研究的内容，促使今后有更多更好的研究郑和下西洋的论著问世。

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明代极盛时期的海上业绩	(1)
第一节 明初政治经济形势	(1)
第二节 明初对外政策	(8)
第二章 郑和的家世、宗教信仰和才能	(20)
第一节 郑和的家世	(20)
第二节 郑和的才能	(27)
第三节 郑和的宗教信仰	(38)
第三章 郑和使团的人员组织和船舶准备	(44)
第一节 郑和使团的人员组织	(44)
第二节 郑和使团的船舶准备	(83)
第四章 郑和使团的航海技术	(118)
第一节 古代中国人民的海洋知识和航海传统	(118)
第二节 郑和使团的天文航海技术	(127)
第三节 郑和使团的地文航海技术	(141)
第四节 郑和下西洋对海洋科学的贡献	(147)
第五章 郑和下西洋的航程	(156)
第一节 《郑和航海图》中的航程	(157)
第二节 《西洋朝贡典录》中的航程	(176)
第三节 郑和下西洋航程的综合研究	(182)
第六章 郑和出使诸国的经过	(219)
第一节 郑和出使的目的和任务	(219)
第二节 郑和下西洋的经过	(235)
第七章 明初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关系	(317)
第一节 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政治上的关系	(317)
第二节 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经济上的关系	(335)

第三节 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文化上的关系	(350)
第八章 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局限性及影响	(389)
第一节 郑和下西洋的成就	(389)
第二节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局限性	(413)
第三节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425)
第一版后记	(444)
修订版后记	(446)

第一章 明代极盛时期的 海上业绩

第一节 明初政治经济形势

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彻底推翻了蒙古贵族腐朽残暴的统治。“自元政失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原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独以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西平汉王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八番，北逐胡君，清肃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1]终于一统天下，于1368年正月在南京即皇帝位，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代新朝——大明帝国的建立。朱元璋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总结了历代王朝治乱盛衰的统治经验，特别是鉴于元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日夜筹虑，力求国家长治久安。朱元璋认为，国家能否兴旺发达，江山能否牢固，全视人民生活好坏而定。他屡次告诫侍臣说：“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自昔昏主恣意奢侈，欲使百姓困乏，至于乱亡。”^[2]为了使民富国强，“建邦基以成大业”，^[3]以朱元璋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在明朝立国之初，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扶植工商，繁荣社会经济的措施。

经过元末农民战争之后，土地集中的趋势得到缓和，自耕农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为恢复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明朝政府又下令把农奴和奴婢解放为自由民，限制官私奴婢的数目，招抚流民，“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又“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4]洪武十八年（1385年），下令士、农、工、商“四民务在各守其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产而游惰及舍匿他境游民者，

皆迁之远方。”^[5]与此同时,“设抚民之官,颁宽恤之条,令天下郡邑,招而抚之。天下之民,感戴宏恩,扶老携幼,竞返桑梓。”^[6]这样一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急剧增多,原有耕地不敷使用,明朝政府又积极采取措施,大力开垦荒地,移民屯田。洪武中,以中原田多荒芜,特设司农司,开治河南,计民授田,验其丁力,计亩配给,免其租税三年。明朝政府不仅多方设法“务俾农尽力畝亩”,^[7]而且大力提倡改良土壤和革新农具,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下令民间如有隙地,鼓励种植桑枣与木棉,并全予免税。同年,又分遣国子监生巡行天下,督修水利。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据地方报告,各处共新开塘堰40987处,新挖河渠4162处。明初重视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朱元璋出身贫贱,深谙民间疾苦,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时,还念念不忘地对侍臣们说:“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惟恐过奢,伤民害民也。”^[8]因此,他不允许以过多的田赋徭役来扰害人民,而对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是严加惩治。由于在农村实行了有利于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政策,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凋敝的农村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据统计,洪武元年(1368年)全国垦田数字为180多万顷,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就翻了几番,激增至8507623顷,辽阔的农村出现了“赳赳无弃土”^[9]的兴旺景象。

为了进一步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国家的收入,朱元璋又师法唐代的府兵制度,寓兵于农,立军卫之法。军卫法为刘基(明初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所拟定,军人另有军籍,军民分籍,有军籍的军人是世袭的,拥有屯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天下“卫所”,计内外卫329处,守御千户所65处,共约190余万人,多为屯田兵。^[10]组织起这样庞大的一支军屯队伍投入生产,对明初农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初把发展手工业也放到重要的地位。朱元璋曾明令各行“工技专于艺业。”^[11]规定诸工匠在应役之外,允许个人自由从事商品生产,鼓舞了手工业者的生产热情,也刺激着他们努力提高产品的工艺水平;手工业生产的门路愈来愈广,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手工业者的队伍。据洪武年间的统计,全国共有匠户232089名,为明初的手工业生产准备了雄厚的技术力量。在明朝政府努力经营之下,具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和印刷等工业部门,都有较大的发展。

官方在全国各铁、铜产地设立冶炼所，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同时奖励民间开采冶炼，每三十分仅抽税二分，民间开办的冶铁炼铜等小矿业，在全国各地也纷纷兴起。全国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在经济较发达的东南各城镇，建立起很多丝织厂，招收工人，使用提花机等进行生产。明初规定苏、松、杭、嘉、湖五府织造，都有常额。生产上的需要，使这些地方传统的农村“男耕女织”式的家庭纺织业，逐步向具有一定规模的纺织工场发展。当时在杭州，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杼机四、五具，……工十数人。”^[12]杼机的广泛使用和纺织工场的增多，使丝织品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奖励种植桑、麻、木棉，在盛产桑棉的地区，丝织和棉纺成为农民主要的副业，又生产出大量的丝织品以供应国内外需要。陶瓷业发展尤为迅速，形成了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出现了像景德镇这样的瓷器生产中心——拥有官窑、民窑 3000 多所，年产品种繁多的精美瓷器数以百万计。造船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广，乃至东北吉林、黑龙江等地都设有造船厂，而以位于南京龙湾的龙江船厂规模最大，能造载重千吨以上性能良好的远洋巨舶。

商业方面，明初针对元代弊政，于洪武十三年（1380 年）裁撤了全国的税课司局 354 所，改由各府州县直接征税，税率很低，规定“凡商税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13]农具以及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全部免税。^[14]在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生产都得到较好发展的情况下，货源自然充足，加以朱元璋重视“商贾以通有无”^[15]的作用，对发展商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性的措施，商业经济也很快繁荣起来。明初，不仅一些大城市“以是薪桀而下，百物皆仰给于贸属”；^[16]就是一些中小城镇，也都成为“商贾往来兴贩”的场所。商业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日益明显。

明朝洪武年间农、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人们“衣食足而知礼义”，当时的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在洪武后期和建文初期，“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17]“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拈起视，恐污践，更置阶圯高，直不取也。”^[18]在一个统一的封建大国中，出现这样的太平盛世，在中外历史上还是罕见的。虽然，朱元璋侈行分封，导致建文帝执政时，中央政权与各地诸王的矛盾激化，爆发了一场“靖难之役”，但这恰恰成为明帝国走向极盛时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就是说，经过此役使朱棣夺

取帝位，才使朱元璋所开创的建国大业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终于在永乐朝出现了景况更“倍于往时”^[19]的明代极盛时期。

朱棣于即位之初，即宣布“建文以来，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复旧制。”^[20]他对建文帝热衷于上古时代的典章制度，随意改变明太祖所创立的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切系军民利害者，可因时损益，既于军民利害无所关涉，何用更改？况前人创立制度，皆有深意，今行之既久无弊，辄改何为？此其所以败亡也。”^[21]明成祖朱棣同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都是以“民之贫富”为治国根本大计。朱棣曾有所感慨地说，若“使四海皆给足”，自己进餐时，即使没有丰盛的美食，没有乐队来助兴，也“未尝不乐”。^[22]如果说明太祖朱元璋是在元末农民战争所造成的累累创伤的基础上，力求国家臻于富强，那么，明成祖朱棣所面临的，同样是在国家经历了“靖难之役”的浩劫之后，去恢复和发展各项生产事业，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好转和繁荣。所以，朱棣对洪武时期所实行的一系列“安养生息”的政策，自然会持“率由旧章”的态度。

长达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给国家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尤其在战区，所遭受的破坏更是惨重。建文帝为了同朱棣的燕军作战，督促官司四出征粮募兵，“徒使中原无辜赤子困于转输，民不聊生，日甚一日。”^[23]战争结束以后，“天下疲于兵旅，而北方凋敝尤甚。”^[24]“长淮以北，鞠为草莽。”^[25]燕王朱棣的根据地“北平、保定、永平三府，……民人衰耗，甚至户绝，田土荒芜。”“北平所属顺天、保定诸郡，连年兵革，其民衣食不给。”^[26]而在战前，这些地方经过朱棣的一番经营，境内“年谷累丰，商旅野宿”，^[27]曾是全国比较富庶的地区。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为了尽快把社会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朱棣三令五申，要求文武群臣不负明太祖朱元璋“创业之艰”，尽心辅治，以成其“守成之道”。^[28]在颁布施政方针时，朱棣郑重申明：“朕当守成之日，正安养生息之时”，^[29]而守成之日的“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施有其序。”^[30]

为了使百姓能够安养生息，朱棣以身作则，作了许多努力。朱棣刚在南京亲政时，居处之后宫虽被建文帝于败亡时焚毁，东宫也全拆掉，“而未敢兴造”。所以，当楚王桢要求资助修造私邸时，朱棣不允，要他对“府中宫室损坏者，姑用护卫之人随时修葺，俟民岁丰，然后量拨军民为之。”并告诫他说：“天下初定，众心未安，劳困未苏，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馁。安养休息，方在此时。”^[31]嗣后，当他闻知“代王桂擅兴土

木，疲劳军民”，立即予以制止，并“命所司自今王府非得朝命，不许擅役一军一民，及敛一钱一物，不听从者有罚。”^[32]不仅如此，朱棣还从积极的方面去努力，他“惟欲举贤材，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33]因此，朱棣所采取的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比朱元璋更注意到“宽猛适中”。朱棣尝感叹：“朕统御天下，夙夜求贤，共图治理，往往下询民间，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实鲜。”^[34]为此，朱棣一再严令各地方官“毋横敛一钱，毋妄兴一役。”^[35]惩办那些肆意加重百姓负担的官吏，经常派遣御史视察民间疾苦，考核各郡县长吏贤否。与此同时，对受战争影响较大的地区，蠲免赋税。如“数年用兵，北京顺天、永平、保定供给特劳”，朱棣便命“免三府田租二年”。^[36]至于赈济灾荒，鼓励农民垦田，令官给耕牛农具种子并免赋税等措施，洪武时行之有效，朱棣依然一一遵行。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尽快发展农业生产，曾实行屯田制，到永乐时期，民屯、军屯都有了新的发展，收效更为显著。明成祖朱棣执政之初，于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诸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给户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后征其税。”^[37]除了移民屯田和招募屯田两种民屯形式外，永乐初还多次迁徙罪囚屯田。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朱棣还下令：“凡人命、十恶、死罪、强盗、伤人者依律处决，其余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种田。”^[38]接着，又制定了将罪囚谪发北京为民种田的则例。朱棣更重视的是发展军屯，战事一结束，即命五军都督府移文各都司，“令卫所屯田如旧制”，“岁终，上其所入之数，以课勤怠。”^[39]永乐初年，又进一步制定了屯田官军赏罚条例，规定“岁食米十二石外，余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40]还在各屯田处所设置红牌，把赏罚条例逐一书写在上面，敦促屯田军士恪守。这种赏罚制度，是因地制宜而施行的，随耕田土质肥瘠不同，“令视其岁收之数参校之，谓之样田。”^[41]这样定出不同标准的岁收之数，肥田多收，薄田少收，就较为合理，更有利于发挥屯田军士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增加军屯的员数，对那些调离原卫所从事其他工作，以及犯法被罚到边疆充军的军士，都命令他们复回原卫所屯田。为了加强对军屯的管理工作，朱棣多次派遣官吏分赴各地妥善安置屯田军民，整理屯种事务，改善经营方式，更定军士屯守的数目等。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永乐时期的军屯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军屯制度的完善，又极大地推动了军屯事业的

发展。“于时，东自辽东，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42]乃至“沿海卫所，皆有屯田。”^[43]大力发展屯田事业，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永乐时期，“屯田米常溢三之一，……以是边饷恒足。”^[44]军屯所获，不仅很大程度上节省了军费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军屯税粮又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水利建设事业，在永乐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朱棣极力要尽快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自然十分重视兴修水利，搞了不少重大的水利工程。如修治疏导吴淞江，就是其中之一。永乐元年（1403年），浙西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刚登帝位的朱棣，深“以苏、松水患为忧”，即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前往治理。夏原吉“日夜经画”，疏浚吴淞下游，上接太湖，度地为闸，以时蓄泄，“苏松农田大利”。^[45]此外，一些地方官吏还主持兴修了不少的水利工程。如东阿邑西南有巨浸，“积潦为害”，知县贝秉彝相视高下，凿渠引入大清河，使之干涸，“得沃壤数百顷，民食其利。”^[46]明初的农业生产，在永乐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与当时举国上下重视兴办水利，有很大的关系。

永乐时期的工商业也发展得很快。洪武时获得一定发展的矿冶、纺织、陶瓷、造船等各项生产事业，由于郑和下西洋所产生的客观需要，不仅经营规模扩大了许多，并且在各地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工厂（场）。商业的发展继续得到明成祖朱棣的大力扶持，照旧实行洪武以来“三十税一”的轻税政策。“靖难之役”结束后，一些遭受战争祸害，“百姓流徙，商贾不通”的地方，朱棣下令商税“免征二年”^[47]以利商业复苏。在迁都北京以后，于皇城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称为“廊房”，“召商居货”，^[48]鼓励各地商贩来京营业。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为便于南粮北运，重新开通济宁至临清的会通河，又引汶水、泗水入运河，自是南北通航，行商往来，“挽漕京师，大为便利。”^[49]影响所及，运河沿岸“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50]“四方百货，倍于往时。”^[51]作为全国商业集散中心的33个大城市，在永乐年间开始形成，全国各地商业贸易日趋繁荣。

由于明成祖朱棣进一步执行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国方针，全力促进农、工、商业的发展，迅速治好了战争的创伤，使洪武时期社会经济初步繁荣昌盛的局面，至永乐朝趋向极盛。“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羨，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廩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52]那些治